

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级疾病书写

颜敏, 彭海宝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 现代都市既创造了崭新的生活也带来了人性的异化,使得都市中产阶级常常身陷疾病的困扰。中产阶级的生理疾病,深刻表现了人类的贪欲及其后果,隐喻现代都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生态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中产阶级的心理疾病,充分表现现代都市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挤压。人们在物欲的追求中抛弃了感性而丰富的生命形态,丧失了精神主体和意志自由,并未获得应有的幸福人生。现代都市的中产阶级应该从物欲世界中走出来,更多关注内向价值的实现,关注自我的生命本真,思考如何在都市生活中“诗意地栖居”。

关键词: 新世纪; 都市小说; 中产阶级; 疾病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3-0104-06

Illness Record of the Middle Class Described in the Metropolis Fictions of in the New Century

YAN Min, PENG Haib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Modern metropolises not only create the new life, but also bring about the humanity alienation. As a result, the urban middle class have always been disturbed by diseases, which profoundly displays human greed and its consequences, implies the damage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es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erious society problems caused by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fully displays the extrusion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es to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In the pursuit of desire, people abandon the perceptual and abundant life forms, lose the freedom of spiritual subject and will, and don't attain a happy life. The urban middle class should come out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ner value, focus on the true nature of life, and think about how to "dwell poetically".

Key words: new century; metropolis fictions; middle class; illness record

都市不愧为人类的伟大杰作,它流光溢彩的繁华和无所不在的机遇,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过,在现代都市崛起的同时,都市的异化力量也逐渐显现出来,直接导致了人的精神紧张和高度焦虑。罗格·梅指出“冲突在主观上是焦虑,在客观上便是疾病。”^{[1](p77)}个体长期处于焦虑之

收稿日期: 2017-02-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叙事研究”(编号: 14SKJD10)

作者简介: 颜敏(1955-),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彭海宝(1978-),男,江西乐平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中,使有机体的自我防御能力逐渐减弱以致丧失,便会导致某种“创伤情境”。在新世纪都市小说中,中产阶级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仍然逃离不了各种生理和心理疾病的困扰。他们所罹患的疾病,不同于乡村社会和贫困人群的常发疾病,表达的社会隐喻和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都市中产阶级患病,隐喻的是现代都市的痼疾,深刻反映了现代性的压迫,也发出了寻求救赎之道、重构诗意都市的诉求。

—

每个人一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身心的疼痛,可以说疾病是生命的别一种状态。正是因为有了痛苦体验,我们才倍加珍惜身心健康。文学史上,疾病与疗救的主题一直受到作家的关注。当代文学中的疾病书写,业已超越疾病的医学意义,被赋予了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等丰富蕴涵,建构了医文互融的独特审美意向。患病让个人获得了偏离常态的“他者”身份,为个人思考生命打开了新的窗口,为社会批判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我们沉溺于常规的社会生活,久而久之,失去了观察与思考生命问题的灵性和穿透力。从“庸常”中跳出来,“他者”眼中反而是真实世界的一种。所以弗洛姆认为“最正常的人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在病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尚没有被压抑到无法与诸种文化模式相对立的程度……”^[2](p567-568) 因为疾病书写独具审美价值,所以才成为都市作家们惯常使用的书写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化进程迅速加快,都市体量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密集,逐渐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栖居地。从正向看,都市对现代文明的推动显而易见,它改变了社会面貌,培育了市民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建构了现代审美维度。另一方面,都市催生的工具理性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和精神困扰。在一些都市作家眼里,都市宛如巨大的“病体”,是一个吞噬自然本性和个人灵性的地方。在高楼大厦包围的都市空间中,人与自然的联系被割裂开来,人们丧失了对四季轮回的敏锐,也无法感受日月星河的诗意,就连亲近泥土的芬芳都成为奢侈。^①传统的乡村社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没”的安稳生活,而都市时序是紊乱的,流光溢彩的街道和灯火通明的大楼把黑夜与白昼连成一体,很多都市人的作息时昼夜颠倒,造成精神的紧张。现代都市把每个人分配在各自岗位上,就好像把螺丝钉安在机械上一样,“人”成了符码和序号,抽空了感性和灵魂,陷入机器的奴隶、“物”的附庸的生存状态。物质世界的诱惑如此强大,人们为了赢取竞争而相互提防、怀疑、伤害,人性之恶在过度的欲望追逐中显露无疑。这些都市“病菌”的扩散,对都市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现代都市作家刻画了都市的病态意象。在现代西方,狄更斯把19世纪的伦敦视为“废墟”,在他的小说中,烟雾、废水、垃圾、墓地、古宅等意象频繁出现,隐喻了工业文明对人心的腐蚀。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灰谷”位于纽约郊区,那里“灰烬”像麦子一样堆成了小山丘,预示着都市道德的溃败。新世纪以来,中国都市作家对病态的都市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刻揭示。邱华栋被誉为“都市病理学家”,长期研究现代都市人的病态、隐疾与暗伤。他把城市比喻为“巨大的疯人院”,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精神病患者、幽闭症病人、怪诞的行为艺术家、窥视狂和自恋的人。在须一瓜的小说《白口罩》中,未知的“传染病”让城市陷入危机之中,在市民眼里,处处都有可能隐藏致命的病菌,只有逃离都市才能保全性命。在晓航的小说《霾永远在心中》里,都市长期受到雾霾的侵袭,人们想出一个奇怪的办法,使用巨大的玻璃罩把整个城市封闭起来,以抵御外面的污染气体。无处不在的“白口罩”和怪诞的“玻璃罩”,让人联想到都市生态危机的严重后果。作家们把现代都市比喻为畸形的“病身”,揭露了都市脱离自然本性之后的种种痼疾,展示了都市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维度。

中产阶级是都市社会的主流群体,也是新世纪以来都市作家们的主要叙事对象。他们普遍接受过

^① 参见彭海宝《新时期都市小说空间书写的三个维度》(《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知识和专业特长,多以从事政治经济管理、教学科研、文化新闻出版和工程技术等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这个都市群体收入稳定,有房有车,物质生活无忧,也是消费的主力。按理说,他们在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的两个层面都令人钦羨,应该较一般人群离疾病更远。但现实生活中,外表光鲜的中产阶层受到各种身心疾病的困扰。在官场、商场和职场上,面对着竞争的挤压,他们常常处于紧张、怀疑和烦躁的情绪中,频繁的应酬也导致生活缺乏规律,一些人无法承受压力而罹患疾病。需要关注的是,这些疾病多被称为“富贵病”,与营养过剩、缺乏运动、精神焦虑等有关系。财富与健康之间并不是等同关系,人们如果无止境地追求名利,忘记了存在的根本意义,既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还会遭受无尽的痛楚。都市中产阶层的疾病书写,是现代都市危机的折光和反射。

二

大致来说,人类疾病类型可分为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先谈生理疾病。新世纪以来都市小说文本中,中产阶层罹患的生理疾病主要有肠胃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孕症等。

通常,外在环境是诱发生理疾病的直接原因。口舌之欲是欲望的一部分,不过古人云“纵口欲而百病生。”过量的饮食产生营养过剩,引起胃肠病、肥胖、“三高”、痛风等多种疾病。与消费主义文化相伴随,享乐主义也随之侵入了都市日常生活。一些中产人士小富则奢,大富则狂,吃要吃得新奇,玩要玩得心跳,一味追求肤浅的、庸俗的、刺激的感官享乐,这种无原则无底线的纵欲,被布热津斯基称为“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在新世纪以来的都市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大吃大喝、骄奢淫逸的场景。在严歌苓的小说《赴宴者》中,展现了当代社会极尽奢侈的百宴图。比如,一道叫“千蟹指”的菜是用一千个螃蟹爪尖的肉做成,“鸽子舌头”则是把几百条小舌头堆在一个盘子里,再配上鲜红的辣椒丝、白色野菊花而做成。在戴定南的小说《折腾》中,某银行行长常常享受“裸体宴”,把“美食”与“美色”一道品尝。这些千奇百怪的饮食,透视了消费主义文化极其丑陋的一面,也讽刺了财富阶层的虚伪和浮华。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与自然生物是平等的关系。我们如何对待他者,他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同为他者之他者;我们如何对待自然,也就如何对待自身,因为我们身处自然之中。人们把大自然的精灵变成了“美味”,必然要付出健康的代价。在王跃文小说《爱历元年》中,孙却从养猪起家到承包工程,生意越做越大。他不满意做了多年的政协委员,想运作关系成为人大代表。因而每天逢人吆喝,张罗饭局,喝得醉醺醺的。不料,被检查出来了胃癌。在苗炜的小说《面包会有的》中,专营食品贸易的商人杨大卫堪称美食专家,好吃、善吃、能吃、敢吃。他结交的女性朱海伦也是地道的“吃货”。他们在朋友的店里吃了一顿蘑菇宴,当天晚上俩人的肠胃都中毒了。病好之后,杨大卫又吃了一顿螃蟹宴,马上就得了急性胰腺炎,被送到医院急诊救治。人们追求新奇古怪的美食,不仅是满足占有的欲望,也是炫耀性消费行为,因为吃什么,在哪里吃,隐含了身份差异和地位区隔。法国思想家卢梭倡导物质生活的简单化、物质需求的有限化,因为“奢侈或则是财富的结果,或则是使财富成为必需;它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对于前者是以占有欲来腐蚀,对于后者是以贪婪心来腐蚀”,^{[3][p89]}他尖锐批判无限制的感官享乐,认为奢侈欲望带给人不仅有享受,还有对人的腐蚀、控制和奴役!在某种意义上,2003年爆发的“非典”,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和惩罚。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灵性,无尽地消费和利用自然,终将尝到恶果。

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叙述了发生在两个虚拟城市的严重环境问题。在创作手法上,晓航依然发挥“智性写作”的特色,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两个相邻城市日益严峻的环境现状,探寻生态危机背后的人性坍塌。新安都市和离语市是两个毗邻的城市。在巨大玻璃罩的保护下,新安都变得清新洁净,而两百里外的离语城,依然笼罩在雾霾之中,城市居民大量发生上呼吸道和肺部感染,还有更多的人不明所以地感冒、发烧,因为这里不仅有本地的污染企业,还承接了新安都的所有污染企业。为了掩盖雾霾,离语城的管理者持续不断燃放烟花,人们在海市蜃楼的景象中又快乐起来。在当代城市中,人人只顾眼前的好处,缺乏危机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其实,环境污染的深层原因是人心的颓败,不去

除“内心之霾”,不把人们从精神困境中拯救出来,生态困境也无法得到疏解。晓航以隐喻的叙事方式表现现实世界,显示出悲天悯人的救赎意识。

人类的生产无非两类: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因而繁衍生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性的终极目标是生殖后代、创造生命,这不仅是肉体生命的生殖与创造,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的繁衍与再造——一种无论是自我还是人类共享一种更好生活的想象与行动。”^[4]古往今来,母性因为担负着延续后代的特殊使命,被世界众多民族崇拜,关于母性的歌颂也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当代社会,由于环境污染和心理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不孕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滕肖澜的小说《倾国倾城》中,银行职员苏圆圆与佟承志夫妻始终无法怀孕成功。佟承志是银行的处长,正为争取副行长的位置奋斗;苏圆圆为协助丈夫上位不遗余力,还要提防丈夫的出轨。俩人事业和生活的压力过大,精神高度紧张,无心也无力生育。陈谦的小说《无穷镜》的主人公珊映一直忙于创业,耽误了生孩子的黄金时机,等到稳定下来后想要孩子的时候,却无法怀孕。

在贫穷的旧时代,由于医疗条件的落后,女性生育的最大威胁来自于难产。在萧红、老舍的笔下,把女性难产致死的场景烘托得无比凄惨,生动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苦命运。相比之下,当代都市女性生活无忧,医疗条件好,却遭受了新的生育问题。对此,一些都市小说进行了深入探讨。赵德发小说《人类世》中的企业家孙参与妻子奋力造人,却始终难以如愿。孙参到医院作身体检查,结果发现自己精子的畸形率达到72%。医生认为,孙参没有器质性问题,很可能与生活习惯有关,如常年喝酒应酬,长期穿牛仔裤等等。繁衍子嗣需要男女双方的共同参与,而男性的精子供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男性精子出现状况则是生育问题的前兆。孙参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惜炸山填海建楼盘,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小说透过孙参的身体病变,批判人类对自然的无穷无尽索取,隐喻生态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生育关乎人类生命的延续,如果连生育都遭受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无从谈起,这或许是来自大自然的强烈警示。

“疾病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体验,是一种对命运、永恒和未来的沟通。”^{[5] [p35]}都市中产阶层的疾病书写,隐喻了都市生活的生态危机,警示我们如何把握人类未来的命运。现代都市脱胎于传统乡村,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显著成就。人类筑城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建造更安稳的庇护之所。未曾料到,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仅被视为人类发展的资源,沦落为人类占有和征服的对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发展迅猛,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都市人群竞相追求吃穿住行的品质,企业制造各类产品以满足社会激增的消费需求,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造成了河流污浊、雾霾肆虐、垃圾围城等严重的生态问题。斯宾格勒认为,人的生命之根在于土地,而城市耗尽了乡村的一切,使乡村宣告破产,这就反过来削弱了城市本身。^{[6] [p91-92]}现代都市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对所经的道路进行反思,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让都市与乡村共生共融,让都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三

与生理疾病相比,心理疾病的成因更为复杂。现代都市中,社会的快速流变、人际关系的冷漠、物欲横流的乱象、精神信仰的危机等等,都严重地压抑和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新世纪以来的都市小说,敏锐关注到中产阶层的精神世界,透视了他们光鲜生活下的惶恐和不安。

抑郁症是现代都市人群常见的心境障碍,又被称为“精神感冒”。它与现代性结伴而行,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中就普遍流露出一种负面情绪,当时被称为“Weltschmerz”,即“厌世情绪”,也就是抑郁症。在现代都市中,抑郁症患者普遍是社会精英,一些发达城市是抗抑郁药消耗最多的地方。邱华栋的小说《白昼的喘息》中的谢悦,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年轻貌美,嫁给了房地产商人后,得到了公寓、私人汽车、信用卡以及充裕的闲暇时间,可她并没有快乐起来。因为老公忙于事业,她常常一个人独守寂寞,患上了深深的忧郁症,经常失眠。邱华栋的小说《花儿与

黎明》中的高伟,是广告公司的老板,拥有上千万的身家,可谓典型的中产阶级富裕人士。但他与妻子越来越疏离,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只能夜夜出入迪斯科舞厅,依靠吸毒麻痹自己。显然,谢悦与高伟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生活贫乏。他们似乎什么都拥有,又感到一无所有,就像掉线的风筝在俗世空中飘摇而无所归依。他们的生活中缺乏爱的抚慰,谢悦得到了丈夫的金钱,却没有得到关心和温情。高伟夜不归宿,终日周旋于女人之间,早已失去家庭生活的庇佑,所谓的亲情薄如纸翼。在现代都市璀璨的夜火下,那些寂寞孤独的灵魂无处安放。金钱无法购买快乐,利益也不能交换幸福。显然,如果我们只顾追求物质利益,甘愿匍匐在摩天大楼之下,搁置人生的终极理想,抽空道德的向善阶梯,终将无法获得脚踏实地的幸福人生。

幻听是一种奇特的听觉体验,也是精神病人常见的症状之一。现代都市无处不在的噪音,既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隐秘毒箭,刺向一个个脆弱不堪的心灵。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在于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都市生活中的各种“噪音”,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危机,展示出商业化社会中人的荒诞、空虚、焦虑和恐惧。在晓航的小说《被声音打扰的时光》中,富家女冯慧桐从12岁起就患上幻听症。每一次病魔来临,无数种类型的声音合成巨大的噪音向她袭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声音的袭击一次比一次沉重,她完全无法入睡。冯慧桐的病症与她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她父亲是金融界的巨子,她母亲是父亲的秘书,两人偷情生下了冯慧桐。碍于门第和面子,她和母亲无法进入父亲的常规生活圈子,父亲可以保障她衣食无忧,却不能公开承认她,更不会给她爱和亲情。她在虚伪的、充满算计的环境中长大,心中充满了怨恨、挫折和不安全感。进入青春期后,她的追求者都是功利的市侩,所谓的甜言蜜语和承诺,都不过是都市的噪音。冯慧桐穿越重重迷雾,发现现代城市噪音的根源在“日出城堡”。这是作者虚构的场域,是一个欲望勃发并极致奢靡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轻易从城堡中逃出去,因为没有人能够消除自己的心魔。作者以可视化的城堡形象,表达了欲望之手的强大操纵力。冯慧桐引诱城堡的主人投资股市,让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招以毒攻毒的手法达到了奇效,消灭了“日出城堡”。看来,解决现代都市噪音的最佳途径,就是消解人的欲望,让人回归纯粹的自然生活状态。

现代都市里的中产阶级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追求更好的社会地位,不得不追随都市的律动节奏,经常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罗洛·梅认为“西方文化如此看重竞逐成功的价值,而可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所引起的焦虑又是这么盛行,以至于我们有理由假定,个人竞逐成功既是西方文化的主导目标,又是最普遍的焦虑情境。”^{[1][p10]}这样的生存情形在中国都市社会同样显现。过度的竞争压力,让人们常常处于焦虑烦躁之中,这对身心的伤害显而易见。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中的骆驼,虽已赚了不少钱,但仍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企业上市。他在找人打通关节的那阵子,总喊“心累”。“我”作为他的合伙人,担心他出事,心里常常是“慌落落的”,最后果然在焦虑烦躁中听到骆驼跳楼而死的消息。在史生荣的小说《教授之死》中,南功、东学潮等人为了争取更高的职务,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全力周旋,常常生活在忧虑和不安之中。最后,南功因劳累过度死在了调研的路上,东学潮倒在了省委组织部的大门口。北村的小说《消失的人类》中的孔丘,是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头上戴着省政协委员的头衔,妻子也很贤惠,却因精神的空虚而自杀。上述人物的死亡不仅是肉体之死,也是精神之死。面对世俗利益的诱惑,他们只知道做加法,希望占有越多越好。他们在物欲的挤压下,精神生活空间不断萎缩,丧失了感性而丰富的生命形态,逐渐迷失了自我,丢弃了灵魂,心灵无所归依,最终落得悲惨的命运。

西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一文中,深入描述了都市精神生活的特征,将神经紧张看作“现代尤其是最近时代”的特征。他认为“大都市个人的心理基础在于神经刺激的强化,后者是由内、外刺激快速而不能阻碍的变化引起的。”^{[7][p20]}个人为了适应都市生活,必须变得理智、机敏、迅速反应和工于心计。物化都市抽空了丰富的人性。都市中的人丧失了精神自由和主体性,不仅没有成为都市的主人,反而成为单一化、平面化的都市符号,也就是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很多中产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为了获得利益耗尽心力,丧失了情感、道德、理想等诸多美好的东

西;功成之后又沉湎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世界中,没有停下脚步歇一歇,更没有静心思考人生的意义,处在迷茫、虚无的精神悬浮状态,无法校准人生的价值坐标和前进的航向。可见,现代都市的精神挤压和人性的异化,才是滋生心理疾病的根源。

综上所述,“生态困境与精神失落是现代人的双重变奏,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8] (p72)} 中产阶层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书写,隐喻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是外在生存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性变异。“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到底仍是人的问题。”^[9] 现代都市人永不满足的欲望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10] (p41)} 现代都市疾病书写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反都市”,更不是要回到田园牧歌的时代,而是提醒我们关注面临的问题。现代都市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建构了多元开放的文明形态,有力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都市中生活下去,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人们要在都市生活得更好,仍然要回答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人类一直在思考却没有得到答案的难题。

根据人的价值的向度,个人的价值可分为内向性价值和外向性价值。内向价值指向人的自身,也就是常说的“自我满足”;外向性价值则指向社会,指个人获得社会的肯定。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应该更多关注内向价值的实现,关注自我的生命本真,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健康发展。其实,在海德格尔看来,“家园”不仅指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两者丧失其一,人类都会陷入孤独的境地。现代都市不仅要让物质生活更加富足,也应让精神家园更加美好。唯有如此,都市人才能安于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从而实现“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 [1]〔美〕罗格·梅.焦虑的意义[M].朱侃如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 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M].冯川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颜峰.论性正义[J].中南大学学报,2012(2).
- [5]邓寒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 [6]〔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7]〔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和精神生活[A].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8]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9]曾建平,韩玲.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向度[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 [10]〔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伏玲)